



走向成材的脚印

陈炎荣 姜 昆 等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封扉设计:尹凤阁

封扉木刻:姜 旗

走向成材的脚印

陈炎荣 姜 昆等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香港分店:域多利皇后街9号

新华书店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63,000字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80,000

书号 11002·597 定价 0.42 元

编者的话

《人物》杂志自1981年举办“走上成材之路”征文以来，收到了许多来稿，我们从中选了一部分在刊物上发表，受到读者欢迎。为使这些文章能与更多的读者见面，以促进各种人材更快、更好地成长，我们编了这本小册子。

收入本书的十二篇文章，有八篇选自“走上成材之路”征文。其它四篇，即王治林的《我的自学经过》，朱继功、容安才的《旅店服务员王仁兴著书记》，何韦的《生活和艺术的强者——记剪纸艺术家申沛农》，姜昆的《我当相声演员以后》，也选自《人物》杂志，因内容也与成材有关，故一并收录进去。

在编辑成书时，有的文章由作者或编者作了少量修改。

目 录

山重水复岂无路	陈炎荣 1
我当相声演员之前	姜 昆 12
我当相声演员以后	姜 昆 40
生活和艺术的强者 ——记剪纸艺术家申沛农	何 韦 55
我的自学经过	王治林 62
大难降临之后	蒋炳奎 74
“西红柿状元”雷安军	马小泉 84
在贫瘠土地里顽强地生长 ——记青年工程师仇书桀	邹一夫 94
他的心灵如此美丽 ——记科学童话作者孙幼忱	陆钟祥 102
书法篆刻新秀程与天	陈小川 110

旅店服务员王仁兴著书记

朱继功 118

容安才

锐气之歌

——记青年兽医李贵兴

刘登华 130

李遵立

山重水复岂无路

陈 炎 荣

人生的旅程是漫长的。在命运的安排下，有的人终生一帆风顺，有的人经历坎坷艰辛。一帆风顺固然值得祝贺，却难于领略跋山涉水的意境。坎坷艰辛，倒能给你带来战胜困难之后的种种喜悦。

我算不上人才，也大于征文要求的“最好不超过四十岁”了，但自问还称得上是一颗有用的螺丝钉。三十年来的经历，颇有可供自学青年借鉴之处。因此想在这里饶舌，谈谈自己。

我生于1933年，只读到高中二年级，十八岁就开始走上生活的旅程。三十年来，命运一直在捉弄我。我变换了六种职业，在崎岖坎坷的小路上，跌倒，又爬起来。虽然满身伤痕，气喘吁吁，但

终究一次又一次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，凭自己的毅力，又在荒原上寻出新路来，找到了柳暗花明的另一村。

我从事过的职业和可统计的工作成绩如下：

文学。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，也当过一年剧团编剧。已出版儿童小说单行本四册，《送侨汇的姑娘》、《省城来的新同学》、《雨过天晴》、《还干不干哪，指挥官？》。均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）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各种文体作品共四十多万字。有两篇儿童小说选入全国选集，还有两篇小说分别选入上海、广州的选集。现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，龙岩地区文学协会议事，永定县文联副主任，《闽西文丛》编委。

教育。1978年1月至今，已当了三年多时间的中学教师，是高二重点班文科班主任。能胜任教学，曾多次被聘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及各兄弟学校讲课，向同行介绍教学方法及教学经验。

银行会计。担任过地区中心支行总复核。

农民。当了八年农民，会做除牛工外的各项农活。

裁缝。做过十三年乡村业余裁缝师，会做单、夹、皮、棉各式服装，曾为农村社员缝制新衣上

万件。

竹匠。会做竹床、竹椅等竹器，以手工制造小竹椅为主，几年时间，做出小竹椅二千多条。

以上所列，与有成就的人才和大师们相比，自然是微不足道的。但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，有一点却值得自慰：尽管环境恶劣，我却并未虚度年华。我的生活是充实的，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益无害的，取之于社会的，并不大于对社会的贡献。

我的遭遇，曾博得家乡许多人的同情，但我自己却一向乐观，从未怨天尤人。我爱好文艺，从小养成喜欢读书的习惯。我在乡下长大，乡下能见到的书是有限的，所以，只要能找到，不论什么书，我都看。进步的，反动的，科学的，迷信的，文学的，医药的，哲学的，社会的，古今中外，香花毒草，一体全收。正由于读的书多了，书与书之间的观点有许多矛盾和冲突，逼着我去思考，去比较，去分析，去判断。我不但没有中毒，反而锻炼了自己的鉴别能力。于是我形成了自己一生身体力行的坚定信念：必须做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。吃的应该是草，挤的应该是奶。

十七岁，我读完两年高中以后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，不能继续上学了。那是1950年下半年，刚

好地区银行招考业务人员，我为了就业而去报考，以最好成绩，被录用为中心支行会计股练习生。在学校，我从未接触过会计业务，也从未学过算盘，现在，却要整天与帐册和算盘打交道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上班第一天，会计股长让我合计一张“日报表”，表上有收方金额、付方金额、收方余额、付方余额四个栏目，几十个科目，每个科目都填列着金额数字，只要求把那些数字合计起来。算盘虽不精通，加法应难不住我吧？我欣然接受，就合计起来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合计完了进行复核，重打一遍时，和第一次合计的数字完全不同。到底第一次错了还是第二次错了？只能打第三次来判断。我打了第三次，出现的是又一个新数字。四遍，五遍，六遍……打啊打啊，打得头晕脑胀，打得满头大汗，整整打了半天，怎么也打不平。股长要数字了，我拿着那一大串不同的合计数，面红耳赤地站在股长面前。股长并未责备我，他拿起算盘，的的答答象倒豆子一般，拨算盘珠的手指，在算盘上飞快跳动。看得我眼都花了。仅仅十分钟，四列合计数出来了。我很怀疑数字是否准确，但股长却用粗重的蘸水笔把数字填写到表格上。我问：“对么？”股长说：“当然对。”

语气是充满自信的。我惊骇地退下来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心里想：要学到股长这一手算盘，恐怕最少也得三年吧！了不起的，伟大的手指啊！

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。我喜欢思考。思考和分析以及一种“别人能做到，为什么我不能”的好胜心常在关键时刻帮我的忙。我冷静下来，认真思考时，往往能找出事物的规律。我发现，加法并不复杂，但数字太多了，位数又不一，有的大到亿位，有的仅是几角几分，近百次的相加，只要有一次的小小失误，就会影响全局。在技术尚未熟练之前，我应该分而治之，把近百项数目分成十队、八队，一队队合计，就不易失误了。即使失误，也不用全部重打。第二天照这样的方案合计，只花一个多小时，就胜利完成了。渐渐地，我把数字从十队八队合并成四队，再合成两队，稳步前进。三个月之后，合计一张“日报表”，我也只要十分钟了。

于是，在银行一年，我很快地掌握并熟悉了业务，从练习生提为复核员，又提为总复核。

1952年到1954年，我调到地区侨务科工作。由于行政工作并不忙碌，爱好文艺的天性驱使我耍起了笔杆子。于是命运和我开了一次小小的玩

笑。大约是1954年初，我写了一篇小品文，题目是《奇异的窍门》，署名“福建龙岩专署 高梓”，这篇小品是讽刺增产节约运动中的某些怪现象的，是综合性泛指稿件，并未指名道姓讽刺哪个具体单位或个人。不料在《新观察》发表以后，却引来一场风波。专署主任秘书认为我是讽刺专署的，作者署名冠以龙岩专署字样就是明证，责令我立即去信更正；财政科长则在大会上说我是恶意攻击和诬蔑。我有口难辩，只得遵令去信请求更正。但编辑部复信说：“谁承认就说明谁心中有鬼，写的有点象他，你可以据此再写一篇！”主任秘书看到这样的复信，暴跳如雷，连《新观察》编辑部也被大骂了一通，说这些民主党派办的刊物，居然敢攻击共产党的机关！

那时我正好犯了个真正的错误：利用职权，把自己食用的三瓶牛乳和两条香烟放在招待华侨的费用里报销了，但金额不到十元。有关领导却抓住了这一点，说我“情节恶劣，屡教不改”，把我的行政职务连同团籍一并开除了，这是我万万料想不到的。那年，我才二十一岁。

虽然受到了这意外而且严酷的打击，但我不愿意就此脱离革命队伍。我还年轻，我要前途。

我犯了错误，我一定坚决改正！为了重回革命队伍，我决心去报考大学。那年秋季，我报了名，领到了准考证，进入了漳州考场。但，招生办事处的同志把我从考场叫出来了：“龙岩专署来了电话，不许你报考。”

一盆冷水兜头淋下，这是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啊！

我回到了乡下的家里。我决心自学。这也好，现在没有人分配我干什么，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学习。我如饥似渴，日以继夜地刻苦攻读。每天晚上，读啊，写啊，总要到十二点才睡。没有人干扰我，也没有朋友，一个受处分的坏人哪会有朋友呢？静静的夜里，孤灯独明，却给了我最好的思考环境。沉重的打击也是对自己最好的鞭策。

两年以后，我出成果了。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处女作：儿童小说集《送侨汇的姑娘》。我第一次尝到了战胜逆境，取得胜利的喜悦。那时我二十三岁。

从此，我沿着儿童文学的道路继续朝前走，十年没有间断。

惊心动魄的十年动乱开始了。

我的命运可想而知。批判、抄家、住学习班之后，笔，只好丢掉了。我是没有工资可领的人，但是我家有，我有妻儿子女要穿衣吃饭。我体力不如人，副业没门路，靠农业工分是填不饱肚子的。为了生活，我得另闯新路。

怎么办？颇费思考。有人劝我做小买卖，也有人拉我弄地下手工卷烟厂，还有人劝我学简单的手艺糊口。虽然纯粹是为了糊口，但我的人生观并没有变。一、违犯政策的事我决不干；二、于人类无益的事我决不干。想来想去，学手艺还是可行的。学什么呢？木匠、泥瓦、理发、缝衣，或者打铁？我的妻子说：“学什么也迟了，哪个师傅会收留三十多岁的老徒弟？”我说：“我体力不如人，智力还不亚于人，我可以自学。”根据自己体力较弱的客观条件，我决心学裁缝。妻子笑着说：“算了吧，别说学不会，就是学会了，谁的布肯让你试做？我的布都不肯给你试。”

我认真考虑了自身的一切条件，以及将会遇到的所有困难，设想了一个又一个方案。自己设计自己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为求速成，我一反艺徒学艺由易到难的规律，胆大心细地采取了直捣黄龙、先擒主帅的战术，第一步就学裁剪。我买来各

各式各样的裁剪书，认真分析、比较、钻研，弄清设计原理，以及中装西装、平面立体、式样特点、排料方法等等的来龙去脉，做到胸有成竹，懂得每一小块零件的作用和可变程度。我还是利用夜晚，干到十二点，一点，两点……算呀，画呀，想啊……

本队的社员出于对我的同情，大力支持了我。居然有人送布来，让我试做了。我十分明白这关键性的第一件的成败是多么重要。我如临大敌，象指挥官部署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一般，设计了一个又一个作战方案，检查了又检查，比较了再比较，但并不怯阵。

我做出了第一件男上装。试穿的时候，我面红、耳赤、心跳，提心吊胆地等候宣判。但是，成功了！式样、大小、长短以及用布量，都符合要求，唯一缺点是缝纫技巧不熟练，针迹不很直，转弯处不够圆顺。

初战告捷，不但增强了我和妻子的信心，也引来了更多的支持者。社员们纷纷把布送了来。仅仅三个月，我成了农村业余缝衣匠。

到1970年，在“一打三反”运动中，又一次重大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。一夜之间，我成了“特务反革命”的嫌疑犯、地下加工厂的黑老板。大字

报糊了一墙。又一次抄了我的家。缝纫机连同针线全被没收了，卧房的门也被封了起来，把我和妻儿子女都赶到走廊上睡。（1979年《榕树》文学丛刊第二辑有一篇我写的小说，题目叫做《欢乐与眼泪》，小说里写到的这样一个情景，就是以我自己的亲身遭遇为依据的。）这还不够，接着竟把我抓起来，锁在一间黑屋子里关了十来天。

运动过去了，我又恢复了当社员自由。但是，生活向我提出了新的课题：缝纫机被没收了，不准缝衣了，靠什么活下去？

不过，三十七岁的我，已让生活磨练得更加成熟和坚强。农村确是个广阔的天地，生活的门路多而且广，数经探索，便被我找到一条可以跨越的小径：毛竹砍下后，小小的竹尾是废料，满山都是，山区人民用来当烧柴。我于是利用这不要成本的小竹尾，自己设计做成了小竹椅。一张小竹椅卖四角钱，群众买来洗脚、乘凉时坐，可以坐上好几年。一天做它两张三张，一元左右的当家钱便进门了。

后来，局面稍好了些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购回了一部缝纫机。于是我身兼三职：农民、竹匠、裁缝，成了个大忙人，整天不得空闲了。

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。我重新拿起了笔，又可以为少年儿童写作了，并且当上了中学教师。

三十年来，我就是这样过来的。祖国是我们的母亲，母亲的儿女这样多，偶然的照管不周是不足为奇的，何况身逢了这个“十年动乱”？怨天尤人，自暴自弃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莺歌燕舞，百花盛开，固然可以赏心悦目；酒足饭饱，娇妻宠儿，也能给人以一时的快慰。但“夜阑人散后”呢？

“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等得秋来冬又到，读书还是等明年。”如果自己不去正视环境，不敢迎击逆境，只盼着良好的环境从天而降，那就很可能一事无成。上大学固然可以成材，却并非唯一的路。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条件，坚持对人民和祖国有益的立场，勇猛进击，柳暗花明，就俨然在望了。今天我们的社会，虽然仍然不是完美的天堂，但与旧社会毕竟有了根本的区别，命运之神，又其奈我何？！

（原载《人物》1981年第3期）

——我当相声演员之前

美 昆

记得是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妈妈总在我耳边唱，“小白菜呀，叶叶黄呀，三岁的孩子，没了娘呀……”唱着唱着，就有泪珠从她的面颊上滚了下来，在她的轻声细调中，渗着我当时根本不能理解的情感。隐隐约约感到在母亲的目光中，似乎有着痛苦，也有着幸福。

一晃就长成人了，整整走完了自己人生历程的第三十个年头。尝到了幸福和痛苦，可能跟妈妈的一样又不一样。体会到这种幸福和痛苦，是儿子对母亲的情感。它不是在儿女情中，而是在祖国的怀抱里……

1

红旗。阳光。红领巾。少年宫。辅导员。舞